

把三明建设得更美好（代序）

● 三明市政协主席 吕少郎

40 多年前，在麒麟山下、沙溪河畔这片古老而沉寂的土地上，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来十万建设大军，奏响了建设福建省重工业基地——三明的宏伟乐章。这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难忘岁月！当年的建设者们风餐露宿、筚路蓝缕，以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硬是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县城建设成机声隆隆、工厂林立的工业城市。

三明，是新中国的怀抱里诞生的新城市，是三明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40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优良传统，继续艰苦创业，把三明建成了一座国家园林城、国家卫生城、全国双拥模范城和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饮水思源，如今，当我们走进三钢钢花怒放的厂房，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建设者高亢激越的夯声；当我们仰望三明昂天耸立的大厦，仿佛还能看到当年建设者挥汗如雨的身影。对他们由衷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三明的历史，理所当然应镌刻下当年建设者的业绩。三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本着这样的初衷，并根据‘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工作宗旨，在世纪交替之年，在三明建市 40 周年之际，征集、

编辑、出版了《崛起》这本文史资料专辑,以记载那难以忘怀的如火如荼的岁月,以讴歌那感人至深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弘扬那世代相继的艰苦创业的传统,以迎接那充满希望的光明灿烂的未来。

翻阅《崛起》,尽管书中所反映的史实还不十分全面、系统,还难免有挂一漏万和失之偏颇之嫌,但我们仍能感受到工地的如火如荼和历程的坎坷曲折。我们期盼《崛起》的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该书的字里行间梳理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寻觅到现实的鼓舞和力量。面对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坚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有党的雨露阳光,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把三明建设得更加美好。“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我们从辉煌的昨天走来,要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三明工业城的崛起

● 梁灵光

50 年代末，三明工业城的崛起，可以说是福建地方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明，地处福建中部，北有武夷山，南有戴云山，中间沙溪穿流而过汇入闽江，是两山之间的一块河谷盆地。解放前，这里仅是一个人口不过 5000 的小县城，叫三元县。给人留有印象的，只有国民党特务办的‘梅列集中营’和一首民谣：‘小小三元县，几家豆腐店，城内磨豆腐，城外听得见。’由于是内地山区，盗匪盘踞，这个县到了 1950 年 1 月，我二十九军奉命开展剿匪工作时，才派八十七师二六一团前去解放。1956 年 10 月，它与明溪县合并，改称三明县。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穷乡僻壤作为福建重工业建设的基地呢？

1954 年，中央打算把杭州的空十团转移到福建来。空军入闽，单有一个福州机场是不够的，还要抢修几个机场。空军工程部部长带了一个很大的地勤机构进来了。省委决定由我担任机场修建指挥部指挥。我们研究，除了抢修福清龙田、莆田、惠安、泉州、厦门、漳州等几个一线机场外，还要在闽西、闽北修两三个二线机场。我陪段部长到龙岩、连城、永安、三明、南平、崇安几个县实地踏看

一下。到了三明梅列一看，那地方恰在两个山头之间，地势开阔平坦，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段部长很满意，打算选作空军基地。可后来实际测量一下，发现对面山头略高一些，净空度不够，会影响飞机起飞，于是放弃了。但三明开阔的地势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1956年，农业合作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化肥供应不足成为一个突出矛盾。福建农民早有使用化肥的习惯，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从海外进口化肥，每年进口化肥都在万吨以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回福建时，一再跟我们说：“一定要抓化肥，要办几个化肥厂，就是当了裤子也要办！”叶飞曾提过一个口号，叫做“化学救国”。所以，我曾叫省工业厅综合试验室主任陈明搞一个化肥厂的设计方案。

最初，陈明设计的是年产合成氨1万吨、加工成4万吨的氯化铵厂，需要投资1000万美元。我们把这个方案报给中央化工部。化工部说不行，全国只在吉林、太原、兰州上三个5万吨的合成氨厂，你福建一个省不能上这么大规模的。况且苏联专家也一直反对用氯化铵作肥料。路子堵了怎么办？我叫陈明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路走。后来，他跟倪松茂（民主人士，当时任省轻工厅副厅长）作了研究，又提出一个年产4万吨石灰氮和16万吨联碱的建厂方案。这个方案化工部认可了。因为福建的山田都是酸性土壤，用石灰氮可以中和它的酸性，也能起杀虫作用；而且福建的石灰石资源比较丰富。

方案初步定了，但由于基建投资安排不过来，拖到1957年10月，化工部才批准福建化肥厂的设计方案，但规模和项目都有所变动。

这时候，中央冶金部也在抓钢铁工业。1957年7月，冶金部召开会议，讨论地方建立中小型钢铁厂问题。会议确定在福建投资兴建一座年产20万吨矿石、10万吨生铁、5万吨钢锭和4万吨钢材的钢铁厂和建设年产200万吨的铁矿山。这对福建地方工业的发

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8月13日,省政府召开第54次行政会议作了研究,责成工业厅提出具体筹建方案。

建化肥厂和钢铁厂,厂址选择要求靠近交通线,靠近电源和资源,还要利用现有城市作依托,尽量减少其他方面的投资。

福建铁矿分布很广,几个主要矿区分布在:安溪的潘田铁矿区,已查明的储量在1000万吨以上,是优质平炉富矿;漳平的洛阳铁矿区储量在1亿吨以上,含铁量也超过60%;龙岩中甲铁矿区储量也在1000万吨以上,属高品位矿石;大田铁矿区矿点很多,面积很大,含铁量达68%以上,专家估计前景很好。此外,三明、上杭等县都有一定储量。

化肥厂的主要原料是无烟煤、石灰石和洗盐。无烟煤分布在闽西,龙岩的苏邦就是一个富矿。石灰石更多,单是永安大湖的石灰石储量就近1亿吨,含碳酸钙在97%以上。洗盐由厦门新建的盐场供应。

一个化肥厂,一个钢铁厂,都面临着选择厂址问题。福、厦、漳、泉都在沿海前线,重工业建设当然不能摆在这几个城市。当时,我们设想把一批大工厂摆在山区,既可将沿海密集的人口疏散到内地,又可以带动山区新城镇的建设,也容易从中央争取到建设项目。

梅列那地方可以说是山区里的平原,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如果在三明建厂,必将带动闽西北山区的开发。8月,我叫工业厅组织一个选厂组到南平、三明、龙岩一线现场勘察一下,提出初步选址方案。同时,我带了省计委副主任石林、工业厅副厅长李彬吾、计委基建局局长王云和工业厅设计室主任陈明等一行5人到南京、大连、吉林参观考察石灰氮厂,一路商讨福建山区沿鹰厦铁路线的带形城市群开发计划。

选厂组于8月中旬和9月中旬先后两次沿鹰厦线路踏勘了12个点,经过比较他们推荐了三明列西。因为三明梅列不仅地势

开阔,占用农田少,有足够的水源、电源,又在鹰厦线上,交通方便,而且靠近主要原料产地,从经营费用、多厂协作、基建投资、国防要求各方面来看都是比较适宜的。

省委工交部和省政府专门开会听取汇报后,同意选厂组的意见,决定以三明梅列作为重点厂址,以福州埠头和南平水汾头为比较厂址,写出厂址选择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华东局,并请参与设计的单位立即开展设计工作。

1958年1月,化工部、冶金部派出厂址复查组会同省委工交部、省工业厅对厂址进行复查。当时,张维兹已经从厦门调来负责化肥厂的筹建工作,兼任省委工交部副部长。他们担心,中央各部来的同志都习惯于在北方大平原上建厂,而三明的厂址是在丘陵地上,会不会被否定。他们租一部大客车,载着中央各部来的同志从福州出发在山里转了两天,看了埠头、桐口、古田、大洲、青州,到了三明一看,都把三明看作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最后在厦门开会研究确定厂址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选择三明梅列作为工业区厂址。复查组作了这样的评价:“三明梅列面积广,列西可资建厂地区约达3.4平方公里以上,沙溪以东地区尚有开阔平地可作城市和轻工业厂地,列西虽然稍有起伏山坡,但就福建省山区来说能够得到这样大而较平坦地区确实不可多得。水源近,水量足,地质情况良好,距离原料供应地近,电源距古田水电站稍远,约150余公里,估计可送电6—8万千瓦,基本可以满足三明梅列地区用电要求,将来地区电源估计共可达20万千瓦以上。铁路接轨便利,仅1.5公里。因此决定择定三明梅列地区为联合建厂厂址。”

钢铁厂、化肥厂一摆下来,配套设施就得跟上。开头,还只是考虑两个厂的公用工程和福利设施,后来,省里决定把重型机器厂、水轮机厂、电线电缆厂等也摆上,这就铺开了重工业基地建设的摊子。

为了统一领导,加强协调,1958年4月,省委批准成立三明重

工业建设委员会，任命张维兹为党委书记兼主任。先后又调派省供销社主任孟健、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景彬、省人民银行副行长闫素、省工会副主席高振洋、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吴永培、龙岩地委副书记范元晖、晋江地委副书记马鸣琴等 10 多个地厅级干部，充任各厂厂长、书记，参加三明建委的领导班子。

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建设，需要精心组织建设大军。当时，我们与中央建设部商量，把西北第三工程公司的一支施工队伍 3000 多人由贺敏学同志带领从宝鸡调过来。这支队伍原是解放军工程兵第六师第十八团，曾参加宁波机场和西安、宝鸡兵工厂的抢修，是一支‘拉得动、打得响、信得过’的建筑队伍。冶金部也把沈阳第八冶金安装公司工程队调来支援我们，后成立福建冶金机电安装公司，职工有近千人。驻在闽南的 9123 部队也奉调而来。

省里还从各专区招收数万名民工支援三明工业基地建设。厦门大学中文系 200 多名学生也来三明工地半工半读。到 1958 年底，汇集三明的建设大军达 10 万人之多。原来荒凉沉寂的山区小镇，一下子成为机声隆隆、人声沸腾的工地。

毫无疑问，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首先是没有住房，大批进场的干部、工人都是自己动手到山上割茅草、搭草棚，有的住民房、住寺庙。没有水，就上山找水源，用竹管把水引下来。没有电，点起松明火把来照明。粮食从闽北、江西调运，蔬菜从闽南用车子拉来。后来，三明县委抽出 6000 多人成立各种专业生产队，才逐步解决了蔬菜、副食品的供应问题。

1958 年 2 月初，国务院批准三明钢铁厂的建设规模为年产 14 万吨生铁、10 万吨钢锭、8 万吨钢材的钢铁联合企业。那年，省委研究决定 1958 年底开始部分施工，1959 年底全部建成投产。其远景规划是，到 1962 年发展为年产生铁 80 万吨、钢锭 50 万吨、钢材 45 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可是，后来一发动‘大跃进’，省委不但要求建设速度加快，保证 1959 年元旦出钢出铁，而且规模不断扩大，

从 20 万吨提高到 60 万吨,最后提高到 100 万吨。这么一来,大家都为‘钢铁元帅’让路,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打‘三钢大会战’,其他方面的建设便一度停缓,因而三明工业建设的总体规划受到冲击。

三钢的建设速度是很快的,其首期工程有两座 255 立方米高炉组成的炼铁车间,一座 1.6 吨和两座 6 吨转炉组成的炼钢车间,两部 500 公厘粗轧机和五部精轧机组成的轧钢车间以及相应的动力、机修车间和水、电、运输系统。土方量为 130 万立方米。工程于 6 月 10 日破土,8 月份建设队伍陆续上场,9 月 3 日正式动工兴建,到 12 月初一期工程的土建部分就完成了,并开始安装调试。

1959 年 1 月 2 日,一号转炉炼出了第一炉钢。

“大跃进”中土高炉炼出来的钢是‘土钢’,钢铁厂炼出来的钢称为‘洋钢’。三钢炼出来的这一炉‘洋钢’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福建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三钢对比,化肥厂的兴建却是一波三折。1958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下达设计任务书,只批准建一座石灰氮厂,年产 2 万吨电石、2 万吨石灰氮。后来省委研究把规模扩大为年产 4 万吨石灰氮,13.5 万吨电石,并且氯化铵厂也同时上马。开头,他们给‘钢铁元帅’让路,斩臂割肉,让出地盘,以后又说‘粮食过关了,吃饭不要钱,搞化肥没有意义了’。生活区被其他厂的施工队占用,厂区内塞进火车站,搞得零乱混杂。1959 年化工部提出一个厂的投资要建两个厂,对原来的设计进行全面修改,降低了标准,结果设计一块,施工一块,修改一块,拖延了时间。化工部的一个干部出差到福州,听说三明化肥厂工程进展慢,至今厂房还未动工,他也不下来看看,回去一汇报,化工部就将一台本来拨给三明的电炉变压器调给广州。后来还是陈明拍了工程施工的照片,赶去北京汇报情况,才挽回了局面。1960 年‘五一’节前夕,石灰氮厂的第一炉电石终于炼成,不久石灰氮系统正式投产。

1958 年底,三明建委向省委提出把三明改为市的建制的设

想。叶飞说,现在全国都在搞‘公社化’,就把三明建委和三明县委合并,成立一个地(市)级的人民公社,统一领导工农业建设。1959年2月,中央正式批准三明建委改为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任命省委书记伍洪祥兼任三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维兹任公社筹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处书记。三明改为人民公社后,与外省联系工作及进行协作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公社”是哪一级的呢?不过是一些小企业吧!所以1959年底,他们向省委打报告,要求将三明人民公社改为市。省里同意了上报中央,1960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三明市,由张维兹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三明设市后,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底,省委决定三明的工业建设‘下马’,将三明市委改为三明地委。由此,三明的工作重点由工业建设转向发展农业。

三明工业城从选址到初具城市雏型,大约用了5年时间,这个速度是惊人的。

三明工业城的崛起,有成功的经验,也出现过失误。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

试想想,1957年还是一个仅有6000多人城镇人口、200来万元工业产值的山区小县,经过1500多天的日夜苦战,建设成为一个拥有13家大中型企业、49家小型企业和12万人口、10700多万元工业产值的新型的工业城市,这是多么卓越的业绩,多么宝贵的创业精神!

三明工业城建设的历史经验需要认真总结,以便鉴往知来。我个人认为,最为可贵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顾全大局、真诚无私的革命协作,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勇于拼搏的工作作风和广大建设者不计得失的冲天干劲。没有这些崇高的精神品质,“大会战”就很难发动得起来,也不会有如此辉煌的三明工业城。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它的失误首先在于过分强调速度。钢

铁厂最初计划需要二年半时间全部建成投产。北戴河会议以后，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省委要求三钢于元旦出钢，来个“开门红”。于是，厂党委就紧急动员全体职工和家属每人捡废铁 30 公斤来炼第一炉钢。捡不到废铁的职工就把煮饭的锅砸了。一号高炉鼓风机装上后，本来要空转 72 小时才能投入运行，为了提前出钢，他们仅空转 24 小时就投入运行，结果发生故障，使刚烧化的铁水凝结在炉膛内，不得不花 6 昼夜时间进行抢修。三钢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是因追求速度而提出来的。所以说，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分强调高速度，绝非是一件好事。

再就是，投入资金很大，经济效益很低。福建‘二五计划’拟定地方工业基建投资总额 32 亿，其中中央和地方各投资 16 亿，而投入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的资金占四分之一多。其效益怎样呢？三钢投产后第一年就亏损 113 万多，以后连年亏损。据统计，20 年累计亏损金额达 9000 多万，到 1978 年才开始扭亏为盈。其他企业如重机厂、化机厂等在此期间也都是亏损大户。一个工业基地的建设，大量投资无疑是必要的，但不顾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这种思路和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诚然，三明工业城的崛起，与‘依靠群众办工业’‘大搞群众运动’分不开。但它绝不是‘破除了迷信专家、光靠少数人办工业的思想’的结果。三明工业基地所上的每一个项目，都体现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数万建设大军中，科学技术工作者数以千计。他们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生产第一线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刻苦攻关，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为工业基地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而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专家，瞎指挥盲目乱干，已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实际上，当年我们正是依靠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带出一支较高素质的工人队伍，才能在三明兴建起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城市。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他

们大都成为各企业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我以为,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应成为三明乃至福建的一个好传统。

(节选自《梁灵光回忆录》)



叶飞与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

●伍洪祥

建国初期，福建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全省电厂的装机容量仅 7000 千瓦，算得上近代工业的只有华侨投资的福州造纸厂和厦门罐头厂，规模都不大。全省三分之二的县不通汽车，勉强通车的公路仅 2000 多公里。没有一寸铁路，更没有钢铁工业，所以我们常说“手无寸铁”。福建工业是一张白纸，几乎一无所有，财政经济非常之困难。由于地处国防前线，不时还有敌机来轰炸，全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156 个大项目，没有一个安排在福建。我们挤出一些钱，也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大力支持，突出地抓了公路建设；“一五”期间各地区都有了公路，解放后不久就抓了古田溪水电站的建设，为日后的发展提供能源。“一五”期间厦门海堤、鹰厦铁路建成后，还建了好几个机场，当时是全国之首。此后，南福铁路也建成了，我们还建成了一批轻工业和机械工业企业，使福建的工业建设有了个良好的开端。

建设三明重工业基地，是当时福建省委的重大举措。1954 年叶飞同志出席中央会议，参与制定“一五”计划回来，他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福建是前线，没有安排大项目，也需要搞个小钢铁厂。他对这件事抓得很紧，从选址、规划、设计、选调干部、调集建筑队伍，到

施工，每个环节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我们选中三明这块山区盆地作为建设钢铁厂、化工、电力等骨干企业的地点。原来仅 3000 人口的山区小镇——三元，成了人山人海、热气腾腾的大工地，从西北调来的建筑队伍，加上民工，上场两万多人。省委派了张维兹（他在厦门指挥过海堤建设）、范元辉等同志担任领导。因协调各方力量工作的难度很大，叶飞同志想让我去挂帅，又担心我不愿意去，刚好林伯渠同志来闽视察，他请林老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说：我本来就愿意下去做实际工作。我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三明建设委员会（有一段时间改称中共三明人民公社委员会）第一书记三年。叶飞同志对我也抓得很紧，要我每月写一份报告。这三年时间，我钻研了冶金技术和重工业建设工程管理，在直接参加实践的同时，还读了炼钢技术专著，确实学到了不少工业知识。福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打下了基础。搞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叶飞同志起着主导的作用。没有当年的苦干，不可能有现在年产 100 万吨钢的‘三钢’和年产几十万吨化肥的‘三化’以及重型机械厂、火电厂等大型工业企业。

（节选自《福建日报》《深切怀念叶飞同志》）

三 明 回 忆

●张维兹

我从 1957 年开始参与三明的开发建设,至 1971 年调离,在三明工作了 15 年,亲历了三明早期建设的全过程。作为一名三明的早期建设者,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关注着三明的的发展,并为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

三明市的前身

大部分的县、市都有它生动的传说和古老的历史,可三明却没有。1960 年 2 月 12 日,朱德同志来到三明视察时,惊讶地说:“以前红军时期,我打沙县时从这里走过,怎么不记得有三明这个地方?”叶飞同志说:“不但你问,郭沫若同志也问,毛主席诗词中提到的宁化、清流、归化,你们把归化搞到哪里去了,地图上怎么看不到?”两位领导人还不知道归化、明溪、三明县和三明在建国后的演变过程。

三明原只是一个名叫三元的小镇,归属沙县。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省政府避难迁到永安,各种军警特机关也就蜂拥而至这个距永安仅 54 公里的小镇,并将它改为三元区。国民党政府又将

特种区升格为三元县，是福建最小的县之一。民谣：“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城外听得见”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块弹丸之地。解放后，1956年，明溪县（原来的归化）和三元县合并为三明县，县城在三元。1960年5月26日，中央批准设立省辖三明市，1964年4月恢复原来的明溪县。

在三明建工业基地的背景和条件

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1957年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我国农业生产急需化肥和发展工业钢铁严重不足的问题，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副总理提出：各省都要有自己大中型化肥厂和各省必须因地制宜建立自己的中小型钢铁厂的设想。从我省当时的情况来看，搞工业建设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一是我省一解放，就建造了装机容量为26万千瓦的古田水电站，保证了发展工业的用电需求；二是“一五”期间为备战需要修建的鹰厦铁路已建成通车，交通运输问题得以解决；三是我省有着丰富的石灰石和铁矿等资源。福建省委在叶飞同志和梁灵光同志的主持下，着手研究筹建化肥厂和钢铁厂的事宜。当时我在厦门任市委第一书记。在省里召开的会议上，我找了当时管工业的副省长并兼省委工交部长的梁灵光同志，提出希望去搞工业的想法，梁灵光表示支持。1957年9月，我便接到省委的调令，任我为兴建的化肥厂书记兼厂长。考虑到方便工作等原因，我还兼任省委工交部副部长。10月，省里又抽调了省工业厅的倪松茂副厅长协助我，同时还从省直机关和大专院校抽调了一批行政、技术干部，形成筹备班子。

筹备组在中央同意立项后即开始选址，有五个候选地点，分别是厦门的海沧、福州的桐岭、永安、沙县的青州和三明县。由于当时海峡两岸紧张对峙的形势和福州尚未通铁路，无法解决运输问题，

因此厦门和福州首先被否决了；永安由于水源不足，青州因地势不够开阔也相继被否决。而地处福建中部的三明县，却因有着穿城而过的流量充沛的沙溪河，有荒漠而开阔的溪谷地，而且刚刚通车的鹰厦铁路正巧也经过这里，天时、地利使这个当时无足轻重的小小三明县，从这时起承担了创建我省工业发展的历史重任。

随后，钢铁厂也因交通等原因将厂址选到三明。原在邵武筹建的石灰氮厂为了与化肥厂配套也选定三明作为厂址。同时考虑到三钢与三化的生产建设需要，决定建设一个共同的机修厂，即后来的化工机械厂。为发展我省的重型机械工业，又上了重型机器厂的项目。这些项目基本奠定了我省重工业基地建设的基础。

几个大型企业先后将厂址选在三明后，为了加强对三明工业建设的领导，1958 年 4 月，省委正式批准成立了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负责全面领导三明工业区的各项工作，由我总负责，任书记和主任。成员由几个大企业的负责人和三明县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同年 6 月，考虑到三明将是我省重工业基地的因素，省里又任命我兼任省重工业厅厅长（1958 年 6 月—1958 年 8 月）。三明建委的性质是作为省委负责三明工业建设的派出机构。

三明建市的过程

在建设重工业基地时，我们考虑还是应该发展一批轻纺工业、服务业与之配套。1958 年底，三明建委向省里提出三明建市的设想。叶飞同志提出“全国正搞公社化，三明就称为公社吧。”1959 年 2 月，省里正式批准将三明建委改为三明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由我任筹委会主任兼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由伍洪祥同志兼任。

1959 年夏，叶飞同志陪同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来三明视察，我向陈丕显同志提出希望上海能支援一批轻纺工业。得到陈丕显同志的同意后，我们从北京请来专家帮助设计三明城市的发

展规划。50年代我国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较好，在生产生活上都向他们学习。而三明的地形类似于沿多瑙河筑成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因此，我们有意将三明建成美丽的布达佩斯似的带形城市。当时规划以沙溪河为核心。西岸为重工业区，以钢铁厂、化工厂为主，配套摆上热电厂、水厂和机修厂（后为化工机械厂）河东岸为行政、生活区，两端的城关、富兴堡和列东是轻工业区，摆上纺织、印染、食品、服装、鞋类以及服务生活的多种轻工品，沿河修建几座大桥，江滨辟为公园。

在上海市的支持帮助下，1960年后从上海陆续搬来了食品、制鞋、纺织、印染、小五金等一批轻纺工业。同时根据省委决定，福州和厦门把当时具有最先进设备的两个福州塑料厂和厦门农药厂（生产乐果）迁来三明。这些企业与三明的重工业相辅相成，为三明的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当年描绘的蓝图，很大一部分已成为现实，这是值得欣慰的。

三明成为公社后，在工作中，因为使用‘人民公社’的名字，遇到不少麻烦。外出联系工作、订购设备、请求援助等都非常不便，“公社是哪一级的呢？”人家总认为三明搞的不过是个小企业罢了。1959年底，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向省委打报告，要求将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改为三明市，省里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报中央。1960年5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设立三明市，由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大跃进”的功过

有人说三明是‘大跃进’的产物，对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三明作为我省的重工业基地的确定是在“大跃进”之前，何况“大跃进”对三明的建设是过大于功。

那个年代，确实有它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整个民族有一股奋发